

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

聚焦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

北京大学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
三星堆特色：不仅有神像，还有祭祀者形象

自1934年三星堆遗址首次考古发掘，1995年金沙遗址被发现并进行首次考古以来，四川的考古学家们经过持续不断地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目前已大致弄清楚两个遗址的历时变化、遗址的空间范围、遗存的分布格局、主要功能分区等基本情况。

在10月30日举行的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意义。

三星堆祭祀坑是怎么形成的？

孙华在论坛上提到，目前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已达成基本共识：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阔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年—前900年间。三星堆遗址这三种文化遗存具有先后继承发展关系，但彼此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三星堆文化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的文化构成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青铜器罕见；后一个阶段的文化构成商文化的影响显著增加，青铜器数量相对较多。

三星堆遗址的城市建设，也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从月亮湾小城到大规模的城市扩建，最终形成三星堆城一大三小的现状。三星堆文化末期，原先位于三星堆西南小城的国家宗教祭祀场所遭到破坏，需要另辟场地处理这些受到毁坏的遗存。因而在动乱过去后，三星堆人在原先的西南小城外护城河边寻找了一个地点，将其平整成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南部挖掘了六个长方形的土坑（后来又增加了两个）。三星堆人在这个广场上举行仪式后，将这些器物掩埋起来。这些坑现在被全部发现，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

金沙遗址和“杜宇时代”有关？

孙华介绍，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



孙华

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该遗址也包含了三种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而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前500年，其中作为中心聚落的年代是公元前1150年—前900年。

随着穿越巴山和秦岭古道的开通，金沙国家即文献记载的古蜀国，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古蜀国的军队参与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获得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战利品，以及中心地区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青铜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十二桥文化铜器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铜器接受了周的技术和艺术，就是这种文化背景反映。

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十二桥文化的古蜀国出现了外部和内部危机。在外部，古蜀国与周王朝的关系恶化，甚至断绝了关系，此后一段时间的古蜀国因得不到外面新技术和新艺术的补充，其文化出现了“滞后”现象；在内部，古蜀族群间也发生了长期的冲突，金沙都城不得不放弃，许多聚落也从此消失，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这就是古史传说中提到的杜宇时代。

三星堆—金沙遗址有三个主要特点

孙华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三星堆遗址

和金沙遗址都有河流横贯，城市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分区。比如城市北边通常是大型建筑，为世俗区；城市南边都有祭祀区或相关遗存。两个区域以河流分隔。

第二个特点，三星堆—金沙遗址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下了大量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迹和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祭祀的色彩。

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在于这些宗教祭祀用的像设和陈设，不仅将祭祀对象即神像，以及中介物制作出来，还将祭祀者制作了出来。比如三星堆的大铜立人像就是祭祀者的形象。孙华介绍，中国古代是不怎么做人像的，也不做具象的神，只做神的牌位和放在神前面的盛放祭祀用品的礼器。三星堆人不仅做出神像和连接人神的器具，还把自己这个祭祀主体也塑造制作出来了，这个很有特色。

第三个特点，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重要文物，比如青铜神面像。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组合铜器，其最高的一件高度达到了2.6米，在全世界都罕见。

三星堆—金沙遗址有三大重要价值

孙华同时解读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重要价值。

首先，三星堆—金沙遗址用青铜构建了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比如太阳神鸟崇拜，两个遗址的相关文物是中国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实物见证。

其次，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遗迹和遗物还体现了强烈的“亚文明”的特征，它们的文化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最后，三星堆—金沙古国还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都城规划思想，也影响到了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杨涛



迪米特里奥斯·阿萨纳苏利斯

希腊文化部基克拉泽斯群岛文物局局长阿萨纳苏利斯：
希腊正与故宫合作
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

10月30日，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主论坛上，希腊文化部基克拉泽斯群岛文物局局长迪米特里奥斯·阿萨纳苏利斯以《基克拉泽斯群岛（希腊爱琴海）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以爱琴海群岛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他还透露，希腊正与中国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为文明互鉴搭建新桥梁。

阿萨纳苏利斯在发言中提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地处爱琴海核心地带，在青铜时代，该群岛凭借金属矿产资源与航海技术崛起为地中海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催生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基克拉泽斯文明。该文明以极具辨识度大理石灰雕像闻名，不仅成为史前艺术的典范，更深刻影响了20世纪现代艺术发展。不过，文明遗产的传承之路并非全是坦途。阿萨纳苏利斯坦言，这份文化瑰宝在20世纪遭遇严峻挑战——由于全球收藏市场对其雕像的狂热需求引发大规模盗掘，大量考古遗址遭毁灭性破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阿萨纳苏利斯特别提到，约3650年前的火山喷发摧毁了繁荣的阿克罗蒂里古城，也将其完整封存于火山灰下，使其成为“青铜时代的庞贝”。这一考古奇迹为研究史前城市规划、壁画艺术与日常生活提供了绝佳样本。目前，当地已建立遗址博物馆，通过保护性展示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古文明魅力。

在文物保护与展示实践方面，阿萨纳苏利斯介绍，希腊政府一方面构建覆盖全群岛的博物馆网络；另一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修订，明确禁止非法文物交易，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遗址修复。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社区深度参与保护工作，通过“文物守护人”计划培训居民担任遗址巡查员，既提升了保护效率，也增强了民众文化认同。

发言最后，阿萨纳苏利斯表示：“基克拉泽斯的经验表明，文化遗产保护没有标准答案，但跨国合作、社区参与和科技赋能是共通路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蕴含 摄影 杨涛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10月30日上午，在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式主论坛上，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以《40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题发表主题演讲，系统梳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实践经验。

2025年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宋新潮介绍，自1987年成功申报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以来，中国现有60项世界遗产，涵盖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混合遗产4项。

宋新潮从五个维度深入解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经验，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在“世界文化遗产促进文物领域国际交流”方面，宋新潮列举多项合作成果：1993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联合举办石窟寺遗址管理云冈培训班，1995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清西陵水



宋新潮

结构培训班，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唐大明宫含元殿、龙门石窟保护、新疆石窟保护等外援项目。敦煌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1989年起长达十年的合作，总结了一套研究保护壁画治理病害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程序。

在“国际理念中国化实践”上，宋

新潮重点介绍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过程，称该《准则》归纳了中国文物保护70余年的经验，同时吸收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是我国第一个将国际理念“落地”的文件。随着国际合作的开展和对有关国际遗产保护文件的认识，不改变原状、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最小干预、定期评估等一系列重要遗产保护概念、理念渐渐被引入中国遗产保护领域。

在迎来40周年的里程碑之年，宋新潮坦言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40年来，中国自觉遵守《世界遗产公约》和《威尼斯宪章》，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际理念持续中国化，促进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 杨涛